臺大歷史學報第 71 期
2023 年 6 月，頁 239-249

BIBLID1012-8514(2023)71pp.239-249
2022.3.14 收稿，2022.12.28 通過刊登
DOI: 10.6253/ntuhistory.202306_(71).0006

§書評§

評程永超，《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：近世日本・朝鮮・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》

大阪：清文堂，2021，374 頁。

吳　政　緯*

一、從對馬眺望東亞

江戶幕府實施「鎖國」政策後，仍透過長崎、薩摩、對馬、松前等「四口」探聽聲息，掌握周邊地區的最新情報。[1]幕府儒臣林春勝（1618-1680）、林信篤（1645-1732）纂輯的《華夷變態》，又稱「唐船風說書」，正是中國船商在長崎留下的見聞彙編。《華夷變態》自日本學者浦廉一（1895-1957）整理刊行以降，備受學界關注。清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豐厚成果，可謂離不開以長崎為中心的遺世文獻；另一方面，清史方家時常困於清廷文字獄、禁書政策帶來的種種限制，〈吳三桂討清檄文〉如此重要的歷史證據，清代史料竟隻字未提，只能求諸《華夷變態》。[2]長崎堪稱在東亞史、中國史等研究領域扮演關鍵角色。

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（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）的程永超教授另闢蹊徑，新作《「華夷變態」的東亞》（《華夷変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；E-mail: andorealer@gmail.com

1 松方冬子，〈「四つの口」の彼方——日本近世対外関係史研究の視野〉，《UP》第 36 巻第 11 號（2007 年 11 月，東京），頁 22-27。

2 林春勝、林信篤編，浦廉一解說，《華夷變態》上冊（東京：東洋文庫，1958），頁 53-5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態の東アジア》，以下簡稱本書）[3]從中文學界相對陌生的新口岸「對馬」，窺探近代 17-18 世紀東亞諸國的互動與肆應。對馬是一座位於朝鮮半島、日本列嶼之間，鄰近朝鮮，卻隸屬日本的島嶼。該島地力貧瘠，山多田少，歷代主政者積極發展對外貿易，尤以日朝貿易為著。對馬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，自然成為日朝雙方共所倚賴的外交樞紐。

本書從東亞的視野，重新探論對馬與日朝關係史的相關問題。全書含序章、終章共九章，正文分為兩部：「通信使與明清中國」、「對馬藩與朝鮮・中國」。以下先依序分疏正文七個章節的內容，進而析論本書的定位、取徑、貢獻，最後就書中幾處論斷提供拙見。

二、內容介紹

第一章〈通信使、燕行使的重複經歷〉的主角是朝鮮官員吳允謙（1559-1636）、洪啟禧（1703-1771），他們皆曾擔任燕行使、通信使，履及北京與江戶，作者稱此類人士為「重複經歷者」。本書整理江戶時代 12 次通信使的三使（正使、副使、從事官）名錄，發現 35 人中有 16 位曾赴京朝天，佔 45%。作者認為，吳允謙受到朝鮮官方青睞，1617 年膺命上使之銜前往江戶，係因他曾經任職東萊府使（相當於釜山市長），具備對日交涉的經驗，加上後來巡按朝鮮各道的豐富資歷。而吳允謙浮海東渡的閱歷，頗有助其 1622 年循海路朝天，完成出使中國的外交任務。洪啟禧則擅長語學，兼通漢語。作者強調洪啟禧在兩次使行中意識到朝鮮譯官能力不足，急需改訂、更新譯官訓練相關書籍，遂屢屢疏言其事。

壬辰戰爭（1592-1598）後，德川家康（1543-1616）一改豐臣秀吉（1537-1598）出兵朝鮮的舊轍，務求恢復國交。第二章〈通信使相關的倭情咨文與明清〉聚焦朝鮮後期向明清朝廷通報日本消息的「倭情

3 書名的中文譯名、章節，以及專有名詞俱出自本書的中文目次與摘要（頁 360-363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咨文」，分析 1643 年倭情咨文的獨特性。1637 年，丁丑下城，朝鮮棄絕明廷，改尊清廷為宗主；1643 年朝鮮奉清正朔後，首次遣使赴江戶。前人研究將此行的起因，歸諸領議政（相當於行政院長）崔鳴吉（1586-1647）的建議。作者綜合《同文彙考》、《清實錄》與倭情咨文等史料，主張朝鮮內部本來存在反對出使的聲浪，朝鮮官方是在清太宗皇太極（1592-1643）的指示下，方才排除雜音，決意派遣通信使。

倘若按照搜集情報的能力排序四口，研究者通常最重視的是長崎，畢竟除了數量可觀的唐船風說書、荷蘭風說書，清朝船商亦連年造訪長崎，交流頻繁。相形之下，通信使旅經對馬、江戶的次數僅 12 次，差距懸殊。第三章〈通信使的筆談與大陸情報的搜集〉旨在重新審視通信使與日本知識階層的筆談，說明通信使搜集情報的脈絡與效益。作者承認這些筆談文獻有其限制，例如次數不多、須受幕府審查，不過也提醒通信使具備直接與幕府御用儒者溝通的優勢。

作者先梳理 1643-1764 年間 7 次通信使的筆談要點，呈現朝鮮使臣與日本儒者圍繞著中國消息的博弈。歷次通信使不斷迴避日方的問題，或選擇敷衍，或草草帶過，致使日本儒者未能獲得實質情報。作者進而聚焦 1811 年的通信使，藉由御用儒者古賀精里（1750-1817）及其弟子整理、編纂的外交對策參考書《後師錄》、《擬答擬問》，再參閱實際進行的筆談紀錄，指出幕府實是受到 18 世紀末俄羅斯南下叩關的影響，企圖透過通信使掌握中朝邊境與遼東地區的狀況，循此瞭解俄羅斯的周邊情形。

第四章〈17 世紀初期圍繞釜山開市的中日朝三國關係〉的主題是壬辰戰後的釜山開市。慶長四年（明萬曆二十七年，1599）起，對馬宗家開始與朝鮮交涉，恢復交往。1609 年雙方締結己酉約條，日方在 1611 年向釜山派出第一艘歲遣船。然而早在 1604 年，朝鮮僧人惟政（1543-1610）、孫文彧便帶著朝鮮禮曹參議的諭文前往對馬，許可釜山開市。本章考察《善鄰通書》、《事大文軌》、《分類紀事大綱》等史料，揭示對馬宗家對幕府隱蔽 1604 年已然與朝鮮互市貿易的事實，朝鮮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則技巧性地向明廷報備 1604 年與對馬開市的決定。事實上明朝、朝鮮與日本對於「開市」的理解不盡相同，而且明廷從未置身事外，自始至終與聞釜山開市的決策。

豐臣秀吉的逝世，宣告壬辰戰爭的終結，預示德川政權的崛起。江戶幕府在戰後的外交策略是以未曾出兵朝鮮的和平姿態，力圖恢復中日、日朝國交。前人研究多將此課題分為中日、日朝兩部討論，作者則在第五章〈17 世紀上半葉經由朝鮮的日明通交談判〉表示日本通好朝鮮，方能增進中日關係，因此日朝關係的改善，屬於中日關係的一環。德川家康更於 1605、1607 年兩次授意對馬聯繫朝鮮，望能轉知明廷，日方盼能假道朝鮮，進貢明朝。1609-1629 年間又有三次交涉，第二任幕府將軍德川秀忠（1579-1632）甚至願意協助明朝，出兵攻打女真。

對馬、朝鮮作為「明廷—幕府」彼此溝通的中介者，其實各有盤算。作者對勘日韓文獻，發現朝鮮確實曾經向明廷報告日方的意向，但一旦中朝關係陷入僵局，朝鮮便選擇知情不報，隱藏曾經與日方接觸的事實。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對馬，宗家雖未得到幕府授意，但顯然機巧地利用幕府此前意欲入貢的舊案，期能藉由朝鮮代為請求，通貢明朝。

四口是幕府的眼睛，不時向江戶傳遞周邊地區的情資。對馬島地鄰朝鮮，素來是日本掌握朝鮮情報的最前線。第六章〈17 世紀上半葉對馬藩與大陸情報的搜集〉以明清鼎革的變局為例，說明對馬搜集大陸情報的管道與成效。作者指出，自 1620 年代起，幕府已期待對馬搜集大陸情報，不過朝鮮對日方警戒非常，常常刻意隱匿乃至捏造假消息。然而這不代表幕府放棄對馬遞呈的情報。事實是江戶頗重視不同管道的資訊，藉此辨別真偽。

第七章〈中朝貿易與對馬藩〉試圖勾勒出日朝貿易、中朝貿易之間的連鎖效應。朝鮮官方為防止貨幣金屬大量外流，擬定八包制度，限定燕行使攜帶出境的白銀數量。1715 年，朝鮮官員嚴格執行八包制度，導致燕行使節團無法在北京購入足夠的生絲、絹織品，再轉售予日方於釜山設立的倭館。倭館貿易是日朝關係的重點，也是對馬的生命線。作者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由此切入，分疏倭館、對馬、朝鮮譯官、東萊商人等不同陣營如何互通聲氣、度過難關，闡明兩條貿易路線存在不可須臾離的關係。

三、評論

本書的標題包含東亞、華夷變態，儘管作者未於書中明確交代命名緣起，揆諸各章內容，大抵涵蓋明末清初的東亞，論述上也注意到明清之別，可謂名實相符。綜觀全書，作者不僅廣搜博覽中、日、韓三地的文獻，同時具備解讀古文書的能力，罕為學界利用的對馬文書便是極佳的例子；加上充分參考多國學者相關研究成果，立論扎實。茲就本書的問題意識、研究取徑及其成果，評述值得關注的貢獻如下。

第一，具體展示將問題意識提升到東亞層級的效益。晚近冠名東亞國際關係史、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果，分析框架多由「單個雙邊關係」組成，例如中朝關係、日朝關係。儘管不乏學者呼籲合併討論，[4]親身實踐者並不多見。本書探究的課題，堪稱日韓史家無一處不涉及，論文專書汗牛充棟。作者提出創見的關鍵，是突破單個雙邊關係的分析架構，從更廣袤的網絡梳理日朝關係史的難題。例如剖析清朝皇帝的意志，如何影響朝鮮官方決定派遣使節前往江戶；跨越國境的白銀流通網絡，又如何意外推動不同勢力的人們展開行動。

通信使東渡日本，通常是為幕府將軍繼位之事道喜。1643 年的通信使有別以往，名義是慶賀德川世子（德川家綱，1641-1680）誕生。單從日朝關係史的角度思考，難以發現皇太極才是促使朝鮮國王下定決心派遣通信使的關鍵人物。1811 年，江戶時代最後一次通信使止步對馬，未能踏足本州，前人研究多將此歸諸幕府輕視朝鮮，進而漠視相關筆談紀錄。惟細查幕府御用儒者與通信使筆談的行前準備，方知德川將軍面對俄羅斯南下的國際變局，冀望從朝鮮使臣口中問出相關情資。納入中國、

4 夫馬進，《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》（名古屋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，2015），頁 25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俄羅斯等種種超乎「日朝關係史」的變因，吾人將可獲致生動、充滿內在聯繫，且更趨近真實的東亞史實像。

第二，重建明清官方關注乃至干涉日本、朝鮮外交的史實。傳統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無庸贅述，可惜文獻殘缺，加上中國史料的結構性因素，易見外邦使臣與主政者的反應，難明北京朝廷的戰略構想，以致研究者假定明清政府對周邊地區所知有限，[5]作為不多，明代尤其如此。作者根據數種堅實的證據，指出漢城與北京之間存在穩定的溝通管道，而明廷的態度時常左右朝鮮的決斷，甚且成為日朝恢復國交的必要條件。特別是此部分述論所徵引的朝鮮史料《朝鮮王朝實錄》、《備邊司謄錄》絕不稀見，值得明清史家重視。

第三，凸顯朝鮮、對馬在東亞地緣政治的地位及其主體性。朝鮮、對馬是中日外交往來的當然中介者，本書澄清朝鮮、對馬聰慧地選擇性轉知訊息，藉此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過程。明鮮關係向來被視為宗藩關係的模範，但作者證明朝鮮並非次次如實通報倭情，而是別有盤算；對馬理應是貫徹幕府意志的傳聲筒，然本書則強調對馬在既有的外交折衝中，企圖編織最適合自身利益的故事，幕府更像是可資利用的對象。因此未來的研究肯定不能忽略朝鮮、對馬的主體性。

最後商榷三個章節的幾處論斷與若干字詞，首先是第一章。本書的旨趣是透過微觀對馬、倭館，以日朝關係史為中心，明晰東亞政治外交史的大局（頁 12、15）。然而第一章以「重複經歷者」為題，格局層次不僅與他章不同，也不存在其他章節彰顯的「聯繫」，例如說明中朝關係變化如何牽動日朝國交的策略。作者申說吳允謙擔任通信使、燕行使之間的關係，主張浮海東渡的經驗，頗有助他後來循海路朝天的任務（頁 58）。倘若此處指的是吳允謙的「海行」經驗，其實正使並不涉入具體的技術工作，這亦非朝鮮兩班善學樂知的學問；如果指的是吳允謙沉著

5 如張存武論及清代中朝關係史，表示「如謂中國於朝鮮一無所知，朝鮮於中國則瞭如指掌，當不為過」。見張存武，〈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4 期（1974 年 12 月，臺北），頁 557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冷靜的應對進退，則應歸諸其人格特質，並非一定經由參與通信使而生。

作者表示，吳允謙因為豐富的外交經驗，仕途順遂，在中央政界扶搖直上。作者雖不否認存在其他因素（個人才能、政治派系），但並非其論述重點。作者主張的是，在 17 世紀初的朝鮮，國際情勢變幻莫測，相較國內的狀況，朝鮮的急務是對外關係。因此吳允謙接受任命，後來一路官至領議政，顯現當時的朝鮮需要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人才。作者筆下的另一主角洪啟禧，則代表 18 世紀中葉東亞國際情勢穩定，朝鮮更注重溝通理解的面向，於是矚目譯官的語學教育（頁 68）。

筆者完全同意明末清初時期，東亞情勢動盪，外交經驗是當時官員重要的政治資本。統計吳允謙前後 5 任領議政的外交資歷，僅 2 位未曾出使外國，列如表一。但是即便在國際情勢穩定的 18 世紀中葉，朝鮮朝廷其實同樣注重官員的外交經驗。洪啟禧出使的年代是 1748 年，以 1740 年代為中心，統計前後 20 年（1720-1760）在任的 21 位領議政，14 位曾經奉命出使，如表二所示。

表一　1618-1641 年朝鮮領議政出使經歷表

任期（陰曆）	姓　名	參與使行
1618.01-1619.03	鄭仁弘	×
1619.03-1623.03	朴承宗	1600 年冬至使
1623.03-1626.12	李元翼	1573 年聖節使、1598 陳奏辨誣使
1627.01-1627.05	尹　昉	1604 年冬至使、1610 年謝恩使、1615 年謝恩使
1627.09-1628.06	申　欽	1594 年奏請使、1609 年奏請使
1628.11-1631.08	吳允謙	1617 年通信使、1622 賀登極使
1631.09-1636.06	尹　昉	1604 年冬至使、1610 年謝恩使、1615 年謝恩使
1636.07-1637.08	金　瑬	1615 年冬至聖節使
1637.09-1638.07	李弘胄	1619 年陳奏使
1638.09-1640.01	崔鳴吉	1637 年謝恩使、1639 年謝恩使
1640.01-1641.08	洪瑞鳳	×

資料來源：任期時間、通信使與明代赴京使的出使年，俱整理自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朝鮮王朝實錄》（果川：國史編纂委員會，1955-1963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表二　1717-1761 年朝鮮領議政出使經歷表

任期（陰曆）	姓　名	參與使行
1717.05-1721.12	金昌集	1712 年謝恩兼三節年貢使
1721.12-1723.06	趙泰耆	×
1723.08-1724.09	崔奎瑞	1697 年奏請兼陳奏使
1724.10-1725.02	李光佐	1715 年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
1725.04-1727.04	鄭　澔	×
1727.07-1729.05	李光佐	1715 年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
1729.06-1732.06	洪致中	1719 年通信使
1732.12-1734.05	沈壽賢	1728 年謝恩兼陳奏使
1735.02-1735.02	李宜顯	1720 年三節年貢使、1732 年進賀兼謝恩使
1735.11-1736.02	金興慶	1725 年三節年貢使
1737.08-1740.05	李光佐	1715 年謝恩陳奏兼三節年貢使
1740.09-1749.09	金在魯	1738 年進賀謝恩兼陳奏使
1750.03-1750.10	趙顯命	1743 年問安使、1749 年進賀兼謝恩使
1751.03-1752.09	金在魯	1738 年進賀謝恩兼陳奏使
1752.10-1753.05	李宗城	×
1753.09-1754.05	金在魯	1738 年進賀謝恩兼陳奏使
1754.05-1758.08	李天輔	×
1758.08-1759.03	俞拓基	1721 年三節年貢使、1754 年問安使
1759.03-1759.05	李天輔	×
1759.05-1760.10	金尚魯	×
1760.10-1761.09	李天輔	×

資料來源：任期時間俱依《朝鮮王朝實錄》；通信使、明代赴京使的出使年整理自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朝鮮王朝實錄》；清代赴京使則參考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同文彙考》補編（果川：國史編纂委員會，1978），卷 7，〈使行錄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18 世紀的最後 25 年，相當於朝鮮正祖（1752-1800）在位期間（1776-1800），學界咸稱這段時期的中朝關係平和融洽。[6]正祖在位時的領議政，從首位的金尚喆（1712-1791）算起，迄末任的李秉模（1742-1806）共 16 位，僅 4 任未曾出使外國。顯然不論是戰亂或和平的年代，朝鮮官員具備外交歷練及實務經驗，蓋為躋身中央政界的重要資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列二表所有官員的首次出使，均在他們成為領相之前。

其次是第二章，作者論及朝鮮於 1617 年向日本派遣回答兼刷還使之後，方才奏聞明朝，涉及「先發後聞」，即先斬後奏。同年出使中國的金存敬（1569-1631）憂心明朝兵部官吏對此事索取賄賂，提議準備相關資金。作者於是判斷先發後聞的行為，能夠透過賄賂解決，由此印證明朝不特別留心回答兼刷還使的倭情咨文（頁 83）。此番詮釋，不免令人感到明廷對此不以為意。其實明代晚期的朝鮮使臣早已知悉賄賂不可免，預先籌措銀兩，不過是為求順利完成使命，應與明朝官方的態度無關。

朝鮮赴京使行之重，莫過於冊封。1608 年，朝鮮使節團在確知明廷決意冊封光海君（1575-1641）為朝鮮國王後，他們離京之際，曾經提供協助的明朝「內宦、從者及各部下卒、館夫、牌子之徒，坌集呼號，爭言有力於封事者五六百人，蔽道盈路」。[7]朝鮮使臣費銀 500 兩，人參 50 斤，人群方散，顯見以賄畢事，不分輕重。例來使事告終，朝鮮使臣有詣闕辭朝之行，明朝宦官也趁機向他們索取賄賂，不與則羞辱。[8]這不是專門針對朝鮮的苛政，明人亦循此規，與衙門溝通事情的方法中外皆然，「各部衙門發一號、施一令，則必先之以賄遺」。[9]是以朝天使臣坦承「重

6 孫衛國，《從「尊明」到「奉清」：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19）。

7 崔晛，《朝天日錄》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、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，《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》第 5 冊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154-155。

8 「闕內之官例索人情，不與則多僇辱，遂以銀三兩、扇子等物給之。」見崔晛，《朝天日錄》，頁 206。

9 崔晛，《朝天日錄》，頁 24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賂之下無難事」，無錢不行，處處皆然。[10]

第七章關於燕行使的正官人數，作者認為是 35 名（頁 278、281）。其實康熙七年（1688）以前並無定數，如天啟三年（1623）為 43 名，[11] 順治六年（1649）為 45 名。[12]康熙七年，清廷始明文規定「毋過三十員」，[13]這套規矩持續到 19 世紀中葉。[14]此外，製術官應作「製述官」，金鐘圓應作「金鍾圓」（頁 123、293、338），應為手民之誤。

結語：邁出東亞史的下一步

「東亞史」是界線模糊、性質曖昧的學術詞彙。在這張標籤下，甚至涵括立場相左的研究，一個東亞，各自表述。[15]晚近以「東亞」為名的研究蔚為風潮，細究內容，仍多以單個雙邊關係為構成基礎，如以析論中朝關係史而稱東亞史，或將中日關係史、日朝關係史的論文合輯，

10 崔晛，《朝天日錄》，頁 155。張存武曾研究清代的朝鮮使臣如何透過賄賂打通關節，雖非專論明代，仍值得借鑑，見張存武，〈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5 期（1976 年 6 月，臺北），頁 409-446。

11 李民宬，《癸亥朝天錄》，收入林基中編，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14 冊（首爾：東國大學校出版部，2001），頁 323。

12 李瑛，《燕山錄》，收入林基中編，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19 冊，頁 579。

13「議政鄭所啓，臣得見今番北京咨文，則正官之數，使之毋過三十員云，似當依此為之。而別使之行，畫員尤為不緊，似當為先減下，且譯官輩亦不可過數率去就，啓下譯官及灣上軍官通融，毋過三十員似當矣。上曰：畫員為先減去，分付使臣通融譯官、灣上軍官之數，更以三十員別姓名開錄，啓下可也。」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備邊司謄錄》第 2 冊（果川：國史編纂委員會，1958-1959），頁 948，顯宗 9 年 3 月 7 日。

14「朝參正官三十人。」見洪大容，《湛軒燕記（一）》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、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，《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》第 18 冊，頁 257；「每歲使行，三使及譯員二十三人，兼醫、寫、畫、日四人，合為三十正官。」見李有駿，《夢遊燕行錄．下》，收入林基中編，《燕行錄全集》第 77 冊，頁 66。

15 相關討論請參閱：甘懷真，〈再論東亞作為一種方法〉，收入呂紹理、周惠民主編，《中原與域外：慶祝張廣達教授八十嵩壽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，2011），頁 1-1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視為東亞史研究。措意單個雙邊關係的史學研究，各地自有淵源，發展早期的共同困境是文獻不足徵。揆諸大韓民國第一代的中韓關係史家，他們是一群對中國史感興趣的東洋史學者，在 1950 年代苦於史料匱乏，甚至連一部廿四史皆不可得，遂利用韓國庋藏的資料，寫就中韓關係史研究的序章。[16]

回首 1950 年代以降的學術史，單個雙邊關係史的分析架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。倘若抹去中村榮孝（1902-1984）、三宅英利與田代和生打下的基礎，本書勢必得先從廓清史實起步，一切從頭來過。正因為日朝關係史累積豐厚的底蘊，迫使研究者擴張丈量世界的尺度，跳出既有的分析迴圈，尋覓新的可能性。告別單個雙邊關係史的取徑，既是此前中外關係史、對外關係史發展脈絡下的必然結果，也是東亞史乃至東亞文化交流史不可避免的趨勢。本書突破傳統日朝關係史的架構，注意中國、俄羅斯等變因的影響，實乃極佳的研究範例。

我們很難想像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知識世界缺少藤塚鄰（1879-1948）、大庭脩（1927-2002）與張存武的文字，離開他們篳路藍縷的啟迪與指引，從乍浦到長崎的航路，往返漢城與燕京的貢道，勢必模糊不清。凡此業績，皆是吾人探索下一階段的資產。程氏的《「華夷變態」的東亞》出色地展示以對馬、日朝關係史為中心的研究成果，如何循著單個雙邊關係史的架構，逐步擴大至東亞，乃至更加廣闊的視界。這個超越既有敘事的取徑，是一份面向所有人的邀請，共同挑戰東亞史地平的極限。

（責任編輯：黃方碩　校對：廖芷青　林于煖）

16 「研究中國歷史的，在資料方面連廿四史也沒有機會看得到。」見辛勝夏，〈韓國的中國歷史教育與研究〉，《韓國學報》第 1 期（1981 年 4 月，臺北），頁 161。閔斗基也表示，韓國第一批中國史學者，受限於研究資料等因素，轉而研究中韓關係史，見氏著，〈韓国に於ける中国史研究の展開〉，收入滕維藻、王仲犖、奥崎裕司、小林一美編，《東アジア世界史探究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6），頁 4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